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 于俊道
主编

罗荣桓 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红色阅读

元帅交往实录

于俊道 ■ 主编

罗荣桓交往纪实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荣桓交往纪实 / 于俊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1-5749-7

I. ①罗… II. ①于… III. ①罗荣桓(1902~1963) - 生平事迹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090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武 云
特约编辑 丁 云
责任校对 张巧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昌平新兴胶印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1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罗荣桓和毛泽东	林月琴	1
尊敬的良师 可亲的长者	萧 华	7
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梁必业	15
“你放心走,不要紧”	苏 静	19
“罗政委刀下留人”	梁兴初	23
“你到特务团去当主任”	肖文玖	28
“祝你这个小主任工作顺利”	刘道生	30
大公无私 办事公道	王宗槐	34
“在红军里,当官的和当兵的都一样”	王东保	41
同甘共苦干革命	陈海涵	45
“如果把电台丢了,我杀你脑壳”	袁 光	53
“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	陈 沂	58
“给你一个极其严肃的政治任务”	吴瑞林	62

卓越的军事才能 非凡的领导艺术	李燧英	80
“你们这支部队不算新部队,应该说是老部队”	温玉成	86
“以后给你们调派一个有名的红军将领”	黎 玉	89
“有的人读书,愈读眼睛愈亮”	黄树则	93
“能不能帮我们增加一些知识分子”	李德仲	99
“这是党的需要”	勒怀刚	104
春雨润物细无声	刘洪德	108
“革命军人嘛,要唱英勇杀敌的歌子”	王汇川	116
在京、青、穗、汉的日子里	张沈川	119
“我要随时随地准备跟恶势力搏斗”	陈 举	123
革命的伴侣——罗荣桓和林月琴	黄 瑶	131
“我们必须为党工作”	罗玉英	158
“要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	罗东进	161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有毛病”——罗荣桓和林彪	黄 瑶	168
编后记		179

“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

——罗荣桓和毛泽东

1937年7月10日，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正收拾行装，准备到部队去。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当时，我有点紧张。这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毛主席曾经冲荣桓发过一次脾气。事情是由一位外宾要到延安来引起的。当时荣桓看到毛主席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感到让外宾见到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毛主席换一床棉被。毛主席见到这床新被子，立即追问是谁让换的。当他得知是荣桓后，就打电话给荣桓，责问为什么要换被子。他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粱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他说话声音很大，虽然有湖南口音，我在电话旁边仍听得清清楚楚的。荣桓接完电话感到毛主席说得很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去把原来那床旧被子再换上。

到了他住的窑洞，毛主席起身招呼我坐下后，很和蔼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我回答说：“我原来是四方面军的，抬过担架，当过宣传员，到川陕后带了一个营的女工兵。”毛主席笑着说：“噢，你还是个营长嘛！你们结婚还没有请我吃糖呢。你们那一天用什么来待客？”我回答：“宋裕和从西安捎回了半袋洋面，吃了一顿面条。”毛主席风趣地说：“怎么，吃面条也不请我？”我忍不住笑了。刚来时的紧张和拘束感一扫而空。接着，毛主席亲切地向我讲起了荣桓的经历和为人。他说，荣桓曾先后在长沙、北京、青岛、广州、武汉等地求学。1972年在武汉大学入了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受党派遣，到鄂南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暴动，带了通城、阳崇农民自卫军100多人抢到江西修

水，参加了湘赣秋收起义。几个团一开始都打了败仗，后来便从文家市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进军。到三湾改编时，有些人在艰苦的斗争中动摇了，有的甚至不辞而别。荣桓坚定地留了下来，被任命为我军第一批连党代表之一，上了井冈山。古田会议以后，毛泽东提名荣桓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并建议任命他为第二纵队随党代表，后又任红四军政委。讲到这里，毛主席说：“为什么让他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他老实。”

提到老实，我不由得向毛主席说起荣桓曾向我讲过的他的一段亲身经历。通城暴动以后，农民自卫军见他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学生，便推举他保管自卫军装在一只皮箱里的现金。队伍从通城向修水转移的途中，荣桓提着这只沉重的箱子，感到十分吃力。这时，有两名农军战士走过来对他说：“先生，你辛苦了，我们来帮你提吧！”不由分说便把荣桓提的箱子夺了过去，荣桓看这两人是队里的战士，便松了手。等到宿营时，那两个人连影子也找不到了。荣桓和我谈起此事时说：“走进革命队伍里的人也并不是都是来革命的，混饭吃的、找出路的，大有人在。”

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说：“你看，从这件事上，他这个老实人也悟出了一条真理呢！所以他对是和、非、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主席还告诉我，第四次反“围剿”以后，荣桓被调离部队改任总政的巡视员和动员部长，仍然老老实实为党工作。他在一个地区领导扩大红军，3个月完成扩红3000人的任务，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接着，毛主席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最后，毛主席关切地问我：“你们新婚不久就要离别，我是不是有点残酷？”我立刻回答：“这是革命的需要嘛！”毛主席满意地点头说：“好，以前你当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当红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啰！”

从毛主席那里告辞出来，贺子珍送了我一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和罗荣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了。她感到荣桓十分忠厚老成。长征之中，她骑了一匹小骡子走得慢，经常掉队。当时荣桓所在部队负责殿后、收容，她经常掉到荣桓所在的部队，荣桓一见她来，立即安排她的宿营、警戒。电话线一架好便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放心。贺子珍说，

她掉队到荣桓所在部队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感到十分安全。

从毛主席那儿回来，我向荣桓讲了毛主席接见的场景。他是不习惯流露自己感情的。他把毛主席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加紧了奔赴前线的准备工作。临分别的那一天，他才对我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二

1942年是山东抗战中最艰苦、最紧张的一年。荣桓曾将这一年比喻为“拂晓前的黑暗”。就在这一年年底，因劳累过度，荣桓得了尿血的病，人日见消瘦，但查不出病因。也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决定在各根据地内实行党、政、军的一元化领导。中央经过反复酝酿，决定叫荣桓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但此时荣桓因病情严重，1943年3月11日，他致电中央，请求准许他休息半年。毛主席接到电报，感到十分突然并表示关切，12日，他和朱德复电：“你的病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同时建议让荣桓的战友黎玉、萧华等多分担一些工作。从那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一直非常关心，经常发电报询问病情，安排治疗和休养。当山东军区新的机构组成以后，毛主席便批准荣桓赴新四军，请当时在新四军工作的国际友人、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诊治。我陪同荣桓于这一年5月间到达新四军军部驻地淮南盱眙县黄花塘。罗生特大夫诊断查明，荣桓的肾脏有病变，但究竟是肾癌还是多囊肾，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罗生特也无法确诊。这时，国民党派李仙洲率九十二军入鲁反共，山东斗争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尽管在新四军医疗、休养条件均好于山东，但荣桓在黄花塘仅住了一个多月，便返回山东。这一年秋季，为了就近为荣桓治病，陈毅同志将罗生特派往山东。但当时在山东仍未买到大一点的X光机，罗生特仍做不出正确的诊断。他建议让荣桓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毛主席复电同意，我便陪同荣桓前往新四军三师，准备从那里再通过地下交通线去上海。毛主席发出同意荣桓赴上海的电报后，又很为荣桓的安全而担心，很快于1944年2月8日又发了封电报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的病情

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毛主席的电报，关怀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当军区收到这封电报时，我们已经出发了。直到2月27日我们到达三师驻地，才看到这封电报。荣桓红军时代攻打梅县中，腹部负过重伤，身上有伤痕。毛主席所说“实含若干冒险性质”即指此。荣桓看到这份电报后，即决定不去上海，又返回山东。

到1945年，荣桓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毛主席考虑到荣桓兼职很多，担子太重，决定将林彪调往山东。8月26日，毛主席亲笔撰稿，致电山东分局：“林彪、萧劲光二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山东。分工：罗荣桓为书记及政委，林彪为司令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如罗因病必须休养时，林代理罗之职务，林、萧均为分局委员。其余不变动。”

然而，到了9月19日，为了贯彻“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央又决定调荣桓去东北工作。此时荣桓因病重已难以支撑下去。他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休养一个时期，如果一定要去东北，他请求不要让他当部队主要领导人。中央复电，由于斗争需要，东北还是要去，到东北后治疗条件可能要好一些。于是，荣桓便率山东军区部队6万余人于1945年年底前陆续到达东北。途中，荣桓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不久改名为民主联军）第二政委。

到达沈阳后，荣桓立即投入紧张繁忙的工作。待调到东北的部队基本安排就绪后，荣桓抽空到前日本陆军医院做了身体检查，照了X光片。日本医生诊断为肾癌，认为必须动手术。罗生特也表示同意，东北局报告给中共中央。当时，前日本陆军医院政治情况我们并不清楚。为了保证安全，毛主席经慎重考虑后，主张让荣桓到驻朝鲜平壤的苏军医院治疗。为此，毛主席还向金日成同志和苏联方面发了电报，做好了安排。我们在平壤，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热情接待。

在平壤苏军医院，荣桓的病再次被确诊为肾癌。由于这所医院是野战医院，不具备施行肾切除手术的条件，院方建议尽快去莫斯科治疗。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联络部门同苏方联系。1946年7月，我陪同荣桓赴莫斯科。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这一手术保证了荣桓能以比较健康的身体投入解放战争紧张的工作。

但是，1949年4、5月间，荣桓在天津视察时，又突然病倒了。他只有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和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有一天他在同一位干部谈话时，突然晕倒了。毛主席得知后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荣桓治疗。黄临行前，毛主席给荣桓写了封亲笔信，托黄转交。毛主席在信中要求荣桓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来安慰和鼓励荣桓，遗憾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抄家，这封珍贵的信件已经找不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仍然十分关心。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期间，工作相当繁忙。他经常要到总政和总干机关去办公，时常还要去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由于经常劳累过度，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需要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毛主席知道后，于1950年9月20日，在荣桓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免书上写道：“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到1956年，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他怕贻误工作，便写报告请彭德怀同志转报毛主席，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毛主席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主席提名，又选举荣桓为政治局委员。

以后，由于身体不好，中央有一些会议，荣桓没有参加，但是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我陪他去了。会址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荣桓参加了一次会议后，毛主席就指示他，会中可以退席，不要勉强坚持下去，可以在宿舍看看文件。有一天，我陪荣桓在院内散步，看到毛主席也在散步。当时，正在除“四害”，到处都是轰赶麻雀。但金牛坝招待所内无人轰赶，因此许多麻雀都飞到招待所里来，唧唧喳喳，十分热闹。我们和毛主席打了招呼后，毛主席挥了挥手说：“你们看，麻雀都到这里来避难了。麻雀还有个避难所，比我们当年下井冈山时还好一点。那时我们连个避难所也没有了。”毛主席说到这里又看看我说：“还是我说得对吧，我们这位病号可是老实人呀！我喜欢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看来，毛主席仍然记得他1937年同我的谈话，他的话似乎就是接着那一次谈话说的。

三

尽管毛主席对荣桓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派最好的医生给他诊治，但是由于当时医学水平的限制，尚不能进行肾移植手术，荣桓的健康每况愈下。到1960年年底，林彪把谭政整下了台，经罗瑞卿和萧华提议，毛主席又决定让荣桓复出，当总政治部主任。荣桓又带病工作了两年多。1963年秋季，不仅血压高，心绞痛时常发作，肾功能也衰竭了，住院不久便报了病危，毛主席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但是，用尽所有办法，抢救无效，荣桓于1963年12月16日下午逝世。

这天晚间，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聂荣臻汇报10年科学技术规划。开会前，毛主席提议与会者起立为荣桓默哀。默哀毕，毛主席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作用。”当晚，罗瑞卿同志便让郝治平同志把毛主席的话说给我听。毛主席对荣桓的评价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

后来我听说，荣桓逝世后，毛主席十分悲痛，几天内都睡不着觉，他写成一首七律《吊罗荣桓同志》：

记得当年草上飞，
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
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
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
国有疑难可问谁？

毛主席这首诗在1963年并未发表，发表此诗已是1978年9月，其时毛主席逝世已经两年了。这首诗正如《毛泽东诗词选》的注释者所说，是

“在悲痛的激情中写成的”。这不仅表现在诗的内容上，也表现在诗的书法上面。从诗句看毛主席的激情犹如江河直下，对用词来不及推敲。从书法看，他写时手有点抖，到最后两句，看笔势似乎已经不能成篇了。这一篇的手迹与毛主席同时书写的曹操诗《龟虽寿》之潇洒奔放，形成了强烈对比。

毛主席写这首诗，无论从内容还是从书法看，都说明他在荣桓逝世后一度处于极度悲痛之中。由此可见毛主席和荣桓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我想，这不仅因为荣桓从秋收起义开始便在毛主席领导下战斗，而且也因为荣桓对毛主席十分尊敬，而毛主席也十分器重荣桓。我这一生中直接同毛主席交谈就有两次，而这两次毛主席都反复强调荣桓老实。我想，毛主席器重荣桓的主要也就在这一点。

（林月琴）

尊敬的良师 可亲的长者

“身经百战摧强敌，留得丰功万古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同志为我党我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毛主席和朱德委员长以深切的悼念之情，将他比作革命风云中的鹏鸟、雄鹰，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伟大生平。每当我忆起与罗荣桓同志在一起战斗的峥嵘岁月，我都愈来愈强烈地感觉到：他那忠贞赤忱、光明磊落的品质，极像一面火红的旗帜，指引我穿越了战争的烽火硝烟，指引我在革命的征程中不断前进和成长。

1930年，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猛烈发展的一年。6月，红四军、红三军、红十二军在长汀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在北上途中，总前委委派我担任红



四军军委青年委员。顶着7月酷暑，我到达了红四军军部所在地——距南昌百公里的刚刚占领的樟树镇。在这里，见到了红四军政治委员罗荣桓同志。他身材魁梧，脸庞略胖，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镜片后一双眸子闪着炽热的光亮，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谨诚挚，和蔼可亲。

那时我才15岁，在政治工作队伍中是最年轻的。而组织却将在红四军里组建共青团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我。当罗政委找我谈话时，我对他说：“我刚到部队，对情况不熟悉，还不晓得怎样开展工作……”他微笑着点点头，首先鼓励我说：“萧华同志，前一段你在兴国县担任共青团县委书记，工作得不错嘛！”接着，他又针对我刚到部队的具体情况说：“这次毛委员调你到红四军，这可与地方团的工作有区别呀。地方上主要是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少先队、儿童团，进行参战‘扩红’工作，而部队团的工作却要着重于对青年士兵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鼓舞战斗意志，服从战争需要，为党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发挥助手作用。在目前这残酷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在我们红军的创业时期，这是为我军思想政治工作打基础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可不简单呀！”他又非常具体地嘱咐我，首先把各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以一部分青年党员为骨干，组织好连队团的支部、小组，建立和健全团的生活。他又嘱咐我，要适合青年特点，通过多样化的方法开展文化活动。要生龙活虎，不能死刻板板。要动员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在战斗中起模范作用和先锋作用……在罗荣桓政委的亲切鼓励 and 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行军作战的繁忙日子里，仅仅用了个把月的时间，就把红四军的共青团组织普遍建立了起来，各级党委也都配备了青年委员。

罗荣桓同志不仅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工作，还手把手地教给我们军事常识，教我们打草鞋，在夜行军中判别方向。有一次夜行军，我第一次碰到尸体，不免有点打怵，罗荣桓同志便鼓励我往前走，不要害怕。我在樟树镇第一次听到枪响，他又告诉我们怎样从子弹的声音判断敌人的方位、远近。他对我说，等你听到子弹的声音，它早已飞过去了。打文家市，缴获了戴斗垣一匹黄骡子。我们又想骑又害怕。罗荣桓同志便吩咐马夫牵稳，鼓励我们大胆上……

罗荣桓同志是个有心人，因为他自己在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里任过连、营党代表，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政治干部熟悉基层、了解战士的极端重要性，所以也就有意给我下基层锻炼的机会。

在打下吉安以后，因为有更多的青年加入了红军，红四军组建了4个连建制的特务营，罗政委特地要我兼任第三连政治委员。这个连有近百名战士，只有7条枪，其余尽是明晃晃的梭镖。后来有一次在刁坑同敌遭遇，特务营参加了突击战斗。我军打垮了敌人两个团。于是我们换掉了梭镖，全都背上了步枪，心里充满了说不出的喜悦。这期间，罗政委对我的工作抓得很细致，经常指导我怎样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怎样调查研究，怎样与比我年长的连长搞好团结，协同工作……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我们特务营参加了活捉张辉瓒的龙冈战斗，嗣后又乘胜向东追击，参加了歼灭谭道源半个师的东韶战斗。由于我们连在平时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所以上了战场，全连士气高昂，猛虎一样地冲锋陷阵，深受罗政委的称赞。

1931年4月，在第二次反“围剿”的战斗打响之前，我被任命为特务营政委。我们的部队隐蔽集结于根据地前部的东固地区，离敌人只有40里地。每天清晨，罗政委亲自领着我们爬山，练习抢占山头。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我军无油无盐，粮食短缺，罗政委就带着我们利用练兵间隙找野笋、野菜来充饥。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与他一块儿带着松明火把，在水田里为捉泥鳅、抓青蛙的战士们照明。他对我讲：“咱们红军的政治工作，在平时就要有意识地、有目的地培养同志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一旦上了战场，领导干部就要鼓舞士气，身先士卒，起到表率的作用。这样才能显示政治工作的威力。”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罗荣桓同志向来是重视培养提拔新生力量的。他常说：“培养干部只在老干部中打圈子，路子会越走越窄。我们配备干部，不能一律看资格，要重视德才，只要有发展前途，就要认真培养，大胆使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到了山东，罗荣桓同志是115师政委，我是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仍经常对我说：“培养新生力量是带方向性的问题。”师作战科的几个参谋都是参军不久的青年人，缺乏战斗锻炼和实际工作的经验，罗政委就经常帮助他们，不仅对他们起草的文件，详细指点，亲自修改，而且寻找机会，把他们放到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去进行锻炼。许多当年经过他培养的青年同志，后来都成了我军的高级干部。

罗荣桓同志经常说，培养干部，首先要了解干部，做广大干部的贴心人。有一次他生病，长期下不了床，我去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发现他对所有的情况几乎都知晓。当我觉着惊奇的时候，罗政委和悦地笑了笑说：



“大伙接二连三地来找我谈心，对我来说，不正好是在病床上进行调查研究的难得机会吗！”接着他又补充说：“关心爱护干部，才能为培养干部创造条件，我们可不能‘阎王爷开店，鬼都不上门’哟！”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工作者，罗荣桓同志有极强的原则性。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干部队伍受到伤害、受到摧残的时候，他敢于挺身而出，保护革命干部。1931年春，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红军有些部队采用逼供信的方式到处抓AB团，搞得人人自危。有人怀疑我们兴国县入伍的全是AB团，乱抓乱杀，许多与我在家乡一块入伍和被带出来的好同志、好战友硬是给杀掉了。我是兴国人，当时也就在个别人的怀疑之列。罗荣桓政委对这些无端的怀疑非常气愤，他说：“萧华从小就在兴国闹革命，到红四军工作后，也工作得不错嘛，又经过战争的考验，凭什么对他怀疑呢？！”就这样，我被保护了。

二

抗日战争初期，山东人民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先后在许多地区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蓬勃开展起来。但由于国民党留在该地的正规军和地方军很多，加上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山东地方党的个别领导同志，没有以主要精力认真发动基本群众，独立自主地建立根据地，山东抗日战争的局面难以进一步打开。1938年4月，山东省委一位同志到达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山东的情况时，毛主席就答应派一支主力部队去。后来，在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决定派兵到山东。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罗荣桓同志的肩上。1938年秋，我奉总部和罗政委之命率领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机关和一部分部队，进抵冀鲁边区的乐陵城，整编了当地武装，组成“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翌年3月2日，罗荣桓同志亲率六八六团到达鲁西地区。第二天，便在郛城西北奔袭敌伪重要据点樊坝，全歼敌伪1个团，为创建鲁西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早在1937年9月，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地区就曾给日军著名的板垣师团以歼灭性打击，因此我们一进入山东即为日军所注目，敌人便寻找各种机会对我进行报复。

对于踏上中国土地的凶恶的日本侵略者，罗荣桓同志总是将它置于历

史的长河中，以深邃的政治眼光进行分析的。他有一次对我们说：“我们中国 100 多年来的历史反复证明，只有将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人士组织起来，艰苦奋斗，才能完成中华民族抗击外来侵略的艰巨任务，才能打败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而组织和领导如此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当。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否则山东的抗战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就这样，在罗荣桓同志领导下，山东军区提出了独立自主广泛开展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各部队一面大力发展地方武装，一面实行了主力地方化，组织了许多精干的小分队，像匕首、投枪似的出没在敌人中间，到处钳制敌人，打击敌人。同时又抽调大批人员组成武工队，采取各种斗争形式，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罗荣桓同志亲自给各个小部队规定任务，指示方法，使他们坚决执行了“避强击弱，避实击虚”，“速打、速决、速走”，“打赚钱仗”等战术原则，我广大军民在山东的土地上伸出无数个铁的拳头，沉重地打击侵略者。另外，我们还广泛地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进行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普遍实行伪属登记，宣传我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开展“唤子索夫运动”。伪军中谁做了对人民有益的事，就给记一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记一个黑点。红点多的可以赎罪，黑点多的要受到人民武装的惩罚。政治攻势与游击战争相结合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了，日本侵略者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地位。例如，活跃在鲁南铁路沿线的铁道游击队，断铁路，炸火车，卸开车厢挂钩，就给枣庄、滕县等地敌人以很大威胁。有一次，我穿越敌占区前往太行山，向北方局、总部去汇报工作时，白天就是在距枣庄七八里地的青纱帐里隐伏的，游击队和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饼、枣子和米汤；夜间，铁道游击队掩护我们穿越了铁路，群众就在我过去之后扫净了马蹄印，然后去向日军报“平安”……总之，在短短的时间里，根据地建设得更好了，山东的土地变成了埋葬侵略者的坟墓，我们却像蛟龙归海一样，可以活动自如、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罗荣桓同志卓越的领导艺术，更集中地体现在指挥广大军民进行反“扫荡”、反“蚕食”的战争当中。

1941 年冬，日本侵略者出于战略上的迫切需要，调动 5 万人马，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所谓“铁壁合围”的大“扫荡”。在相当艰苦的 50 天反“扫荡”中，沂南县的留田突围是最惊险的一幕。敌人出动

了坦克和骑兵，动用了几十门大炮和数百挺轻重机枪，分成十一路从四面八方压向沂蒙山区，把我们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集结在留田一带的部队重重包围了。举目望去，大路、小路、山谷、田野，就连放羊的山径上，都是黄溜溜的日本兵。很显然，敌人是不惜血本，孤注一掷，决心要以大于我们20倍的力量置一一五师首脑机关于死地。在军事会议上，大家围着地图对突围方向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往东，有的提议向北，也有的坚持向西。罗荣桓同志穿着灰棉军装，扎着黄皮带，打着“人”字形绑腿，穿着旧布条打成的草鞋，不言也不语，耐心地听着同志们的分析和争论。大伙争论得难解难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罗政委。只见他大手一挥，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应该向南突围！”往南，明明是敌人的心脏临沂呀！对罗荣桓同志的决策，大家感到相当吃惊。罗荣桓同志环视着大伙，眼镜后面的眸子分外有神，他镇定自若地分析道：“日军‘扫荡’，妄想围歼我们山东的指挥机关，集中兵力向我中心区合围，后方必定空虚，我们乘机插到他们的大本营临沂地区，他们是料想不到的，这就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这样，我们机关直属部队两三千人马在茫茫夜色里，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而且勒住了马嘴，宣布了不许打电筒、不准咳嗽的行动纪律，在仅2里多宽的两山空隙之中向南穿插。那天晚上，我随先头连走在前面，看得见大小山头上火堆连着火堆，火堆旁闪动着敌人巡逻兵的身影……情况果然像罗政委分析的那样，敌人后方空虚，戒备不严，他们也万万没有料到，一一五师会有这样的虎胆。结果是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安全地、巧妙地跳出了5万敌人的严密包围。

突出重围以后，我们转移到了蒙山地区。罗政委立即安排了反“扫荡”的第二步，他声音洪亮地告诉我们：“现在我们要折回头往北走，重新杀回沂蒙的中心根据地去！”他的脸上掠过一丝忧虑，深情而激动地说：“同志们，沂蒙山区是咱们的老根据地，那儿的群众与我们血肉相连，前天敌人在那里扑了空，现又在布置新的‘合围’，必然要像疯狗一样地在根据地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我们要坚决地杀回去，把敌人的主力调出来，粉碎日军的‘扫荡’。”我们趁着夜雾往回插。那个晚上，无月无风，一片漆黑，日军恰好又分成七八路，偷偷摸摸地往南反扑了。他们穿着大皮鞋，为了不发出响声，全都在公路两旁的田地里走。我们的侦察排，悄然前进，在前面担任向导的民兵，有的竟然在黑地里摸到了日军头上的钢盔（日军执